

中古文学研究 | 范子焯 主编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古 佛教文学 研究

普慧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古文学研究
ZHONGGUWENXUEYANJIU



主编◎范子焯

中古佛教文学研究

普 慧◎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西安 北京 上海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古佛教文学研究/普慧著. —西安: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2014.6

(中古文学研究/范子焯主编)

ISBN 978-7-5100-8138-5

I. ①中… II. ①普… III. ①中国文学—佛教文学—古典文学研究—中古 IV. ①I207.9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29105号

中古文学研究·中古佛教文学研究

主 编 范子焯
本册著者 普 慧
责任编辑 薛春民 赵亚强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
地 址 西安市北大街85号
邮 编 710003
电 话 029-87214941 87233647(市场营销部)
029-87235105(总编室)
传 真 029-8727967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建科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1/16
印 张 28
字 数 420千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0-8138-5
定 价 80.00元

☆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本公司更换☆

《中古文学研究》编辑出版委员会

编委会

顾 问 许逸民

袁行霈

主 编 范子烨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琳(山东师范大学)

王永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朱晓海(台湾清华大学)

刘运好(安徽师范大学)

刘志伟(郑州大学)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

孙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

苏瑞隆(新加坡大学)

周建渝(香港中文大学)

周绚隆(人民文学出版社)

赵敏俐(首都师范大学)

胡 旭(厦门大学)

胡大雷(广西师范大学)

胡阿祥(南京大学)

侯长林(铜仁学院)
奚彤云(上海古籍出版社)
徐公持(中国社会科学院)
曹旭(上海师范大学)
康达维(美国华盛顿大学)
傅刚(北京大学)
普慧(四川大学)

出版委员会

主 任 张栓才 孙延凤

副 主 任 薛春民

委 员 赵亚强 李一星 毛蕊 白晓群 马可为 冀彩霞
唐娟莉 张博山 侯长庆 王昭 薛强 张拓

校对人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欣 马志林 马志超 元文广 王少宁 车向东
王娅维 王娟 王静 毛蕊 吕洋 朱成英
孙晓喜 刘艳卿 刘蕴娇 张拓 李一星 李小奇
李成 李彦荣 李晓静 李艳 李莹 李朝艳
季桂增 屈雪琛 姚艾 侯苍峰 茹英 赵飒飒
赵珊珊 高春民 党翔宇 逯宏 翟传鹏 薛强

出版说明

“中古”这一概念源自西方,本特指西方封建制时代。一般以476年西罗马灭亡至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其时限范围。晚清以来,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也套用“中古”“近代”这些概念来划分中国的历史时期,但至于哪些朝代属于中国历史上的“中古”时期,史学界并未有一致的观点,或以秦汉至唐代为中古时期,或以汉末至唐代为中古时期,或以秦汉至清前期为中古时期;而文学史上的中古时期基本可等同于古人所说之“八代”,即上起东汉末年,下迄陈、隋,大体即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王瑶《中古文学史论》之“中古”即是这个时代范围。此次出版的这套《中古文学研究》丛书主要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为限,个别著作涉及范围扩至唐代。

本丛书作品虽主要以魏晋南北朝文学为研究对象,但由于作者的不同学科背景、研究方向的差异,其作品风格、角度也不尽相同。有的属于“文选学”研究著作,如傅刚教授的《〈文选〉版本研究》和胡大雷教授的《〈文选〉诗研究》;有的属于学科交叉研究著作,如普慧教授的《中古佛教与文学研究》和胡阿祥教授的《中古文学地理研究》;有的属于“家族文学”研究著作,如刘跃进教授的《门阀士族与文学总集》和丁福林教授的《东晋南朝谢氏文学集团研究》;有的属于专体文学史研究著作,如王琳教授的《六朝辞赋史》;有的属于语言学研究著作,如王云路教授的《中古诗歌语言研究》;有的属于文学名著专题研究著作,如范子焯教授的《魏晋风度的真实写照——〈世说新语〉研究》,除了以上单本专著,还有范子焯教授辑录的《中古作家年谱汇考辑要》(三卷)。我们力求全面、深入地整合当下

中古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的最新、最权威成果,通过中古文学与文化研究辐射中古时期社会的整体风貌。

本丛书的一些作品是在作者以前著作的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的,故而较为成熟。此次集结,被列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我们倾全社会之力谋划,并有幸邀请到范子烨教授担任丛书主编,原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华书局编审许逸民先生和中央文史馆馆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袁行霈先生担任顾问。在范子烨、许逸民和袁行霈三位先生的通力擘画点津和各位作者的鼎力配合下,以及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下,这套《中古文学研究》丛书才得以呈现在读者面前。我们衷心感谢为这套丛书提供过帮助的各界朋友!谨以此丛书为中古文学研究界献礼!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编辑部

2014年6月

序

去年暑假,老友范子焯先生突然打来电话,说拙著《南朝佛教与文学》出版已十年,可以另找出版社再版。他正在组织编辑一套丛书,欲将拙著《南朝佛教与文学》纳入其中。近些年来,因为杂务太多,我竟然忘了拙著出版的年时了。所幸的是,学界老友们并未忘记它,还把它当作有价值的书籍再次推出,这令我感动不已。值此书修改、增订之际,谈点我对本书书名更改为《中古佛教学研究》的理解和本书修改、增订的情况。

“中古”,是一个时间概念,具体所指并不统一。《辞源》:“今一般以魏晋南北朝隋唐为我国历史上的中古时代。”《现代汉语词典》:“在我国历史分期上多指魏晋南北朝隋唐这个时期。”《汉语大词典》:“今一般以魏晋南北朝至唐宋之间为中古,亦有把两汉包括在内者。”《辞海》未收录该词。尽管词典学家们基本给出了“中古”一词的基本时间范围,但是在具体学科的使用上,却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别。譬如,文学界把“中古”的指涉范围多划定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如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詹福瑞《中古文学理论范畴》、蒋述卓《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胡大雷《中古文学集团》等。与文学研究界不同的是,史学界则把“中古”的范围扩展到了汉至唐五代,如荣新江《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胡戟《陈寅恪与中国中古史研究》等。在英语世界里,与“中古”一词有联系的有两个术语:一是 the mediaeval times,一是 the middle times。这两个术语前者一般汉译为“中世纪”,后者多译为“中古时期”,所指涉的时间范围都是西罗马帝国(Western Roman Empire)灭亡到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开始,即公元476年至14世纪(century)。不过,前者在汉译中不易产生歧义,而后者虽与中国的“中古”容易混淆,但似乎更容易让中国读者接受。因为修订本在时间和内容上,已经扩展到了

汉与唐,原书名已不能涵盖,故采用史学界惯用的“中古”含义,在英译时为 the Middle Ancient Times,使汉文、英文更加接近。

佛教文学是一个有别于佛教的独立系统,就其所含之范围而言,虽然横跨两个学科,但它所指涉的范围和对象则主要是指佛教经典中具有文学特质的文本(texts)和这些文本的作者及其社会历史环境,其性质仍然属于文学。但是由于“文学”概念的含义极其复杂,其指向不断游动,以至于今日学界也未能给出一个较为统一的内涵与外延。一般来说,近代以来的文学指向,更偏重于抒情的、虚构的、唯美的、象征的、叙事的特质;而古代的文学指向,则比近代以来的文学宽泛了许多,除上述特质外,还包括实用的、说理的、文献的、材料的特质。这就给我们确定佛教文学的范围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如果以古代文学观念来衡量,显然过于宽泛;而以近代以来文学观念作为标准,则又偏狭。如贾谊《过秦论》、宗炳《明佛论》、韩愈《原道》等议论文则难以进入文学园地。因此,我在考虑“文学”时,拟将古代和近代的文学观念相中和,不偏不倚,不中不边,一切以分析、论述为方便。由此而拟构的佛教文学可能与一般文学会有一定的差异。“佛教文学”同“佛教与文学”既有不同又有联系,前者较为单一,不能囊括后者;后者则完全涉及两个不同领域,以关系为纽带。但是作为“佛教文学研究”,则完全可以把“佛教与文学”之关系讨论纳入其中。其实,这种将“××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纳入文学史中的做法已经是屡见不鲜了,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等,都有这样的例子。这样,我将原著“南朝佛教与文学”统摄于“中古佛教文学研究”,似乎也不为过。

原著《南朝佛教与文学》共七章、两篇附录,所涉及的时间段集中于南朝,上不过东晋末,下不越隋,地域上也以江南为主。当时撰写时,因时间仓促,有几个章节题目列出,却未能完成具体内容的撰写,留下了诸多遗憾。我曾在原著“后记”中说:“南朝佛教与文学,关系复杂,内容繁多,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加进去。譬如:南朝的诸文体与佛教,佛典翻译与南朝文风,佛教与南朝文学理论范畴,南朝文学对佛教僧传写作的影响,等等。”此次修订,我把近十年来撰写的与上述问题

相关的内容重新编成三章,分别为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另加两篇文章作为附录,将原著的两篇附录合并为第八章,这样就形成了全书十一章加两篇附录的格局。时间上上接两汉,下连唐五代,可谓是真正的“中古”了。在篇幅上,也增加了近乎一倍的文字。

中古时期的一千年正是佛教传入、生根、长枝、开花、结果的时期,也是佛教由初传走向鼎盛的时期。在此一千年中,佛教由一个外来的宗教文化渐浸为中国本土的宗教文化,并跃居为三大主流思想文化之一,对精英思想和民间文化产生了至深至远的影响。佛教典籍的汉译,产生了有异于本土文学的汉译佛典文学。汉译佛典文学的通俗化,打破了长期以来本土精英文学追求唯美的倾向,开辟了通俗的佛教讲唱叙事文学的新途径。精英文人的崇佛、信佛,改变了其原有的思想观念。精英文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死亡观等,不再狭隘、单一、保守;信仰的力量和思维的拓展,导致了他们在文学创作上胸襟的大气、视野的开阔;宇宙、社会、人生的合一,成为文人关注、思考和书写的对象;想象和联想的无拘无束、自由驰骋,突破了本土儒教的禁锢;天堂、人间、地狱的立体结构,成为文学世界新的空间构架;前世、今世、来世的轮回联接,成为文学世界新的时间链条。善恶报应、佛性本具,使得道德的提升镶嵌于文学之中,突显了道德与艺术的高度统一。中古的文学活动、文学现象、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思想、文学精神、文学意象等,大多是在佛教思想指导、佛教原型建模(modeling)甚或直接作用(direct effect)下开展、催化、凝练、形成的。中古佛教文学虽有异于一般文学,但在一般文学的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有时甚至直接导致了一般文学走向轨迹的改变。如在佛教梵呗、转读、唱导、悉昙直接影响下而出现的“四声、八病”,就导致了唐代格律诗的繁荣。此次修改、增订本的第九章、第十章涉及了这些内容。

惠能是中国禅宗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也是整个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重要人物。因此,无论是哲学史、思想史,还是一般历史,都会留出大量的篇幅给予介绍。但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很少有人言及。其实,惠能不只是哲学史、思想史的,也是文学史的一个重要人物。据说惠能本人目不识丁,但他的诗歌写得非常精美和精深。如那两首脍炙人口的诗偈(gāthā)“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

性常清静，何处惹尘埃”；“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静，何处惹尘埃”^①。他赢得了一代开创宗派的祖师地位，改变了佛教在中国的历史走向。他的禅思想，成为盛唐以后诗歌创作的思想源泉；他的故事细节，则成为后代小说的素材。如家喻户晓的《西游记》第二回“悟彻菩提真妙理 断魔归本合元神”，说孙悟空至菩提祖师处学艺，祖师拟教他本领，结果孙猴很是挑剔。“祖师闻言，咄的一声，跳下高台，手持戒尺，指定悟空道：‘你这猢狲，这般不学，那般不学，却待怎么？’走上前，将悟空头上打了三下，倒背着手，走入里面，将中门关了，撇下大众而去。唬得那一班听讲的，人人惊惧，皆怨悟空道：‘你这泼猴，十分无状！师父传你道法，如何不学，却与师父顶嘴！这番冲撞了他，不知几时才出来呵！’此时俱甚报怨他，又鄙贱嫌恶他。悟空一些儿也不恼，只是满脸陪笑。原来那猴王已打破盘中之谜，暗暗在心。所以不与众人争竞，只是忍耐无言。祖师打他三下者，教他三更时分存心；倒背着手走入里面，将中门关上者，教他从后门进步，秘处传他道也。”“三更学艺”一“事”，显然出典于《六祖坛经》。元宗宝本说，惠能“书此偈已，徒众总惊，无不嗟讶，各相谓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时，使他肉身菩萨。’祖见众人惊怪，恐人损害，遂将鞋擦了偈，曰：‘亦未见性。’众以为然。次日，祖潜至碓坊，见能腰石舂米，语曰：‘求道之人，为法忘躯，当如是乎！’乃问曰：‘米熟也未？’惠能曰：‘米熟久矣，犹欠筛在。’祖以杖击碓三下而去。惠能即会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三更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教及衣钵，云：‘汝为第六代祖，善自护念，广度有情，流布将来，无令断绝。’”^②从这些情况来看，将惠能纳入文学视野来加以研究，似乎也不为越界或扩界或掺杂。因此，此次修改、增订本的第十一章较为集中地讨论了禅宗六祖惠能的有关情况，从时间点上而言，他涉及了唐五代。

据现有资料，佛教最早是通过陆地丝路(the Silk Route)传入中原的。两汉时

^① 此出敦煌本。元代宗宝本已改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大正藏》第48册，第349页上）

^② 《大正藏》第48册，第349页上。

期的西域(Serindia)龟兹(Kučīna)国既是陆地丝路北道的一个军事重镇,也是佛教传入内地的重要驿站。龟兹国民约秦汉时接受佛教,并且全民信仰。在整个中古时期,龟兹盛产佛教学者,如白延、佛图澄、鸠摩罗什等。在佛典汉译的过程中,诸多术语是通过龟兹语直接音译过来的,而不是源于梵语音译。如“沙门”,梵语为śramaṇa,龟兹语为 samāne;“波逸提”,梵语为 pāyattika,龟兹语为 pāyiti 等。就意译而言,如“外道”,梵语为 mithyādr̥ṣṭi,意为“谬见”;龟兹语为 parnaññe,意为“外”。所以佛典中一些术语的汉译并非由梵语原本直译而来,而是由译自梵语原本的龟兹语等中亚土著语转译而来,甚或直接由此类土著语译出。由此可见龟兹佛教文化的兴盛状况。据学者研究,龟兹国民为吐火罗人(Tocharian),是公元前两千年左右从南俄大草原,即乌克兰(Ukraine)、黑海(Pontus Euxinos)、里海(Caspian)迁徙而来的一支游牧民族,属白种人(Caucasian)。他们定居沙漠绿洲(desert oasis),建城市、开农田、修水利、通商贸,至西汉时,已蔚为西域之大国。汉武帝开始,帝国强盛,周边民族不断内附,政府设置五大属国,以安置归附边民。其中,上郡龟兹属国即是其一。宣帝、元帝时,龟兹人不断长途迁徙至安置点上郡龟兹属国。他们的到来,在人种和文化上都留下了不少痕迹。特别是在语言上,上郡龟兹人的佛教文化遗存更加突出。同时,以“三国”历史为题材的诸多叙事文学中的貂蝉这一人物,疑似为吐火罗的对音,为吐火罗人。关于这一内容,我将其作为附录之一。我研习佛教文化三十余年,从未用我的本名发表过文章,皆用笔名“普慧”。学界诸多友人不解,坊间也有诸多猜测。此处借修订之际,将我笔名来历的解释文字作为附录,以释其然。

这里要说明的是,后三章的内容或某些表述与前七章有重合之处,有些材料也有重复使用的情况,但就总的方面而言,每一章都有各自的重点问题,范围也有区别,所以,还可以说是浑然一体的。此外,研究佛教史,经常会遇到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棘手问题。譬如说关于“大乘”“小乘”的说法,当时双方确有相互贬抑之意。然今天的研究,若抛开这些术语,则难以说明历史问题。因此,我的研究仍然尊重历史情况,坚持使用这些术语,但决不含有派别贬抑之意。诸如此类,特意说明。在修订过程中,一个在我看来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就是对本书的

佛教术语全部加注了梵语原文^①,这是因为佛教名相繁盛,一词多译、一词异译的现象甚为普遍,如果不对术语加注梵语原文,就会造成对汉译术语的误会、曲解。如原本是一个术语,因为汉译的多译,经常会导致人们的多重理解,把问题复杂化了。另外,对原著的诸多错讹、疏漏,做了订改。但由于本人学识浅薄,加之时间仓促,错讹之处仍会存在,恳请方家、大德、善知识批评惠正。

佛教文学研究虽然已历百余年,论著也有不少,但毕竟是冰山一角、沧海一粟。佛教文学领域之广袤辽远,内容之深湛精奥,亟待有志者开垦、拓展。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学者走向这一领域,愿本书能成为有志者通向佛教文学彼岸的一楫,也恳望勇猛精进者舍楫登岸、得意忘言,终成觉悟。

普 慧

二〇一三年八月初于蓉城

^① 梵文的书写符号有多种,因为排版的原因,我采用了国际上通行的拉丁字母转写。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佛教的发展与晋宋思想文化的特质	(10)
第一节 南下、过江高僧对东晋文化的影响	(11)
第二节 刘宋帝王与文人的佛教活动	(25)
第三节 文人参与的佛学讨论及刘宋学术文化重“义理”的特质	(32)
第二章 佛教哲学与晋宋山水文学	(40)
第一节 山水审美的产生与宗教的联姻	(43)
第二节 般若学与山水文学	(48)
第三节 净土思想与山水文学	(61)
第四节 涅槃学与山水文学	(72)
第三章 齐梁文人的佛教活动及其佛学思想	(88)
第一节 齐梁文人的佛教实践活动	(89)
一、结交名僧	(90)
二、盛办法会	(93)
三、实践戒律	(95)
第二节 齐梁文人的佛学思想	(98)
一、佛教神不灭论	(98)
二、二谛义与法身义	(101)
三、夷夏之辨与佛道之争	(105)

四、三教并用与三教归一	(108)
第四章 齐梁文人崇佛诗歌之创作	(111)
第一节 引佛语入诗歌	(112)
一、禅	(113)
二、梵	(114)
三、慧	(116)
四、尘、六尘	(118)
五、法	(119)
六、净	(121)
第二节 表现佛教“空”义的诗歌	(123)
第三节 游写佛寺的诗歌	(129)
第五章 诗歌声律与佛教	(138)
第一节 诗歌声律的发生与发展	(139)
第二节 汉语反切及声韵对佛教梵语、梵呗的借鉴	(146)
第三节 诗歌四声说的形成与佛经转读、佛教悉昙	(156)
第六章 梁陈宫体文学与佛教	(167)
第一节 “宫体”之释名及南朝浮艳文风	(168)
第二节 天竺生殖文化与佛典艳事	(172)
第三节 中土传统的生殖文化与晋宋齐梁的浮艳之风	(186)
第四节 宫体文学中的色欲空相	(192)
第五节 陈代宫体作家与佛教	(202)
第七章 佛教与五朝叙事小说及“世说体”、史传文学	(210)
第一节 小说的叙事性结构与佛教	(212)

第二节 佛教故事、譬喻对志怪小说的影响	(218)
一、人生观和道德观	(219)
二、时空观	(226)
三、情节、叙述人	(230)
四、奇特的想象	(234)
第三节 佛教与“世说体”及史传文学	(236)
第八章 南朝文论思想与佛教	(248)
第一节 佛教禅智论与东晋南朝的审美虚静说	(248)
一、虚静说的提出	(248)
二、慧远的禅智论	(249)
三、慧远禅智论对审美虚静说的升华	(254)
四、宗炳对审美虚静说的贡献	(259)
五、刘勰对审美虚静说的贡献	(262)
第二节 《文心雕龙》的成书及其与佛教成实学	(267)
一、《文心雕龙》成书时间考证	(267)
二、刘勰向沈约献书时间考证	(268)
三、刘勰与沈约之关系	(269)
四、刘勰直接献书于沈约之因	(271)
五、《文心雕龙》与佛教因明学	(272)
六、《文心雕龙》与佛教成实学	(275)
七、《文心雕龙》与《成实论》之关系	(277)
第九章 佛教与汉魏六朝文学	(282)
第一节 佛教的传入与佛典的翻译	(282)
一、佛教的传入与中国人对佛教的接受	(282)
二、佛典翻译的兴起与翻译的标准	(283)

第二节 佛教对文人思想观念的影响	(287)
一、佛教的时空观与立体思维	(287)
二、佛教的人生观:空、幻、梦、苦	(291)
三、佛教的死亡观:无常、涅槃、轮回	(296)
第三节 佛教与文学活动	(304)
一、文人崇佛文学	(304)
二、佛教与文学集团	(311)
三、佛教与文学流派	(317)
第十章 佛典文学及其影响下的本土文学变化	(324)
第一节 佛教元典文学	(324)
第二节 佛典翻译概况	(328)
第三节 汉译佛典文学	(331)
第四节 佛典汉译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337)
第十一章 禅宗六祖惠能与文学	(345)
第一节 惠能与其碑铭的三位文人作者王维、柳宗元、刘禹锡	(345)
一、王维的第一碑	(345)
二、柳宗元、刘禹锡的第二、第三碑	(352)
第二节 禅宗六祖名诗小考	(360)
附录一 两汉上郡龟兹属国及其文化遗存考臆	(376)
附录二 释“普慧”	(392)
主要参考文献	(398)
主要人名索引	(419)
后记	(427)